

小巴那的背包！小巴那的背包！ 吉增刚造

“写真与语言”

有如功能完全相反的记号

为创作献给大川小学去世的四年级学生铃木巴那的诗句，我来到石卷。大川小学位于受到东日本大地震海啸侵袭的北上川河口，学校前面一直处于施工状态，在那里建造的防护堤犹如怪兽一般。我经常去石卷，而就在电车建成完工，铁道路口的起落杆开始抬起的时候，诗句倏地涌现而来。那是只有在灵光一现的瞬间才会闪现的。那首诗（《“依恋！”\“rouge！”》）已经在《现代诗手贴》2022年12月号上刊登，但我觉得仍然有待润色的地方。修改之后的就是现在这首诗，可我打算再加以修改。当我伫立在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创伤前痛苦斗争的时候，有幸得到一次拍摄照片的机会。我正体验着一种未曾有过的经验。

11月20日，我带着原稿，被车载导航驱使着来到大川小学。因为想要挖开校园，途中还在永旺买了儿童用的小铲子，总觉得这样做就可以触手可及那来自遥远的呼声“小巴那”。和在雨中等待多时的学艺员一同在纪念馆看了受灾地区复原模型、书包、影像资料，过程中越发意识到，不能做诸如在校园里挖洞那类看似简单图片说明、装模作样的事情。就在那时我脑中浮现出几头大象用鼻子敲击校园的画面。摄影是种不可思议的事物，表达着自己的语言。我一边捂着稿子，一边走向雨中的校园，拍摄诗稿和其他什么东西在一起的画面。原稿本身宛如薄纸做成的坟墓，奉献出它们就构成了拍照的行为。

我都不清楚自己写了这些，虽然最终和我们所认知的诗集有所不同，但读原稿的时候却很在意“赤”……。法国诗人兼友人米歇尔·德吉的书中有“依恋”这个词。2022年2月米歇尔去世。当我回想起他，随即联想到米歇尔诗作背后夏尔·波德莱尔的依恋。那时，波德莱尔的《我心赤裸》和书包的红色在我心中擦出火花。辞典里查书包一词，原来是来自荷兰语。小巴那的背包。从法语里意为“背”的“Dos”的读音入手，注音假名。我能够体会法语、英语、各种语言的语感，然而与其说掌握多种语言，更像是通过注音去捕捉那一丝往往被隐藏在语言里的东西。在书写中留下这些伤痕：划线，让言语左右晃动。那并不仅仅是语言。

关于老朋友、小说家中上健次，渡边英理女士花费十年时间写了《中上健次论》（INSCRIPT）。中上健次最在意的就是“小巷”，执着于小巷的差异。渡边女士同时还提出“假设”的概念。这与仓石信乃先生的著作《风景以后——北岛敬三的写真》（photographers' gallery press no.14）是一致的：“在没有被拍到的事物里才能表现出摄影的本质”。这与认为摄影不过是拍摄虚构事物的想法相呼应，在这个经受海啸灾害而无法复原也无以言表的、什么也看不见的校园里，我脑中浮现的是设想中会出现的摄影的本质、与“看不见的写真”。

我虽然不至于想要成为摄影家，但一向很喜欢摄影，也有很多搞摄影的朋友，荒木（经惟）就是，还有高梨丰、东松照明。其中冈田隆彦是个老朋友，他见证了《挑衅》创立的现场。荒木和我都很排斥《挑衅》，叫喊着“那些家伙太政治了，不行”，视他们为眼中钉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们以不同的形式继承了失焦模糊精神。也有周围那些讨厌的读者继承了精神的情况发生。认为读者都是那样的存在会比较好。即便中平卓马和冈田都死去，我依然行走在失焦模糊的激进道路上……。激进的地方、越境、经常性地跨越类别。

该如何用光去捕捉时代气息的洪流？听到有人说，想要创作接近波德莱尔的诗作很难，不去做也罢。但也会听到“不管怎样再试试”的声音。如果能在读诗人的心中留下一道深刻的痕迹，就足够好了。如若那道痕迹与照片相重合，那自己就是如愿以偿了。归根结底，这是至死都要坚持下去的。

1939年生于东京。庆应义塾大学毕业。自1964年发表诗集《出发》以来，已成为现代诗坛的代表性人物。1990年首次于Gallery Verita举办摄影展。近年曾举办展览有1998年“水边言语雕塑吉增刚造——诗与雕塑与摄影”（斋藤纪念川口现代美术馆），2000年摄影展“Le Jardin Palimpseste”（巴黎、斯特拉斯堡）。